

上海的世界主义
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



学人文丛

李欧梵 自选集

上海的世界主义
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
香港电影：嘲讽与寓言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重游布拉格札记

上海教育出版社

ACADEMIC SERIES OF OVERSEAS SCHOLARS

策划
许纪霖

学人文丛

李欧梵 自选集

李欧梵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欧梵自选集/李欧梵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5

(学人文丛)

ISBN 7-5320-7918-X

I. 李... I. 李... III. 文学理论-文集

N.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4023 号

学人文丛

李欧梵自选集

李欧梵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71,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50 本

ISBN 7-5320-7918-X/I·14 定价:22.00 元

自序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文章,与其说是自选集,不如说是“代”选集。承蒙许子东、王晓明两位先生——也是现代文学界的同行和我多年来的朋友——极力推荐后,从几本旧作中选出来几篇文章,内容参差不齐,一半是学术论文,一半是文化评论、读书札记和杂感。其中的论文多是英文原作,经过他人译成中文的,在此我要特别向各位译者致谢。他们的姓名我不能一一引出来,但仍希望他们能接受我这份谢意,并容许我收在这个集子里。

我在大陆的学界和文化圈中并不陌生,也有不少朋友。如果这个集子中的某些文章能够有助于爱好中外文学的年轻读者,我会感到十分欣慰。当然,我更愿意得到各位同行学者的批评和指正。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

于香港

112-55

目 录

自序

浪漫一代

文学界的出现.....	(1)
郁达夫:孤寂者的漂泊	(31)
郁达夫:自我的幻像	(61)
徐志摩:感情的一生	(78)
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	(114)

话语的边缘

“批评空间”的开创.....	(137)
——从《申报·自由谈》谈起	
现代中国电影传统初探.....	(155)
香港电影.....	(175)
——嘲讽与寓言	

上海摩登

重绘上海文化地图.....	(191)
上海的世界主义.....	(232)
双城记.....	(248)

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265)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280)

欧游心影

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 (301)

捷克现代民族诗人塞浮特 (318)

哈维尔的启示 (326)

布拉格一日 (335)

重游布拉格札记 (358)

主要著作目录 (373)

文学界的出现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陈独秀在他的《新青年》杂志中,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随之发生的,已成今日广为人知的历史。早期由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组成的“文学革命军”,成功地把论战的矛头指向一个不太难对付的敌人(文言文)。白话文逐渐得到全国性的应用,文学杂志纷纷涌现,而所谓的“新文学”也正式形成。^[1]

在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创刊以前,上海的出版业至少持续发展了二十年。要为“文学革命”这一部精彩剧目(也许可以算是“五四运动”最辉煌的一面以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找到合适的背景,就必须首先了解上海的

出版市场,还有它的前驱——报业。

通商口岸的文学报刊

自唐代以来,就有一种形式不一的官方报纸,在京师范围传布皇令和朝政。^[2]晚清期间,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兰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3]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发表政见和议论的现成渠道,因此偶尔会遭到朝廷取缔。^[4]

而在发展中国的非官方报纸方面,西方传教士也担任了开拓者的角色。一八一五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Daily*),开创了出版民报的先河。此后,十九世纪后期,通商口岸的外语报章和杂志数量激增;一八五〇年创办,广受欢迎的 *North China Herald*,标志着这一发展的巅峰。为此,上海成为首批目睹中国报业在西方传教士及新闻从业员指导下起步的城市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王韬在香港成功开拓了中文报业。在上海,《申报》(一八七二年创立)和《新闻报》(一八九三年创立)是世纪转折之际最著名的两份报纸,而两者在初期都是由外国资金所支持的。^[5]

一八九六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由此设下先例,把报纸作为逐步灌输新思想及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媒介。^[6]他在这方面并不是孤军作战的。一九〇四年,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狄楚青创办了《时报》。一九〇五年,当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对华工待遇不平等的法案时,《时报》在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7]在辛亥革命蓄

势待发之际,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加入梁启超和狄楚青的队伍。章炳麟在上海主编了著名的《苏报》。一九〇三年,当他和别的编辑被捕入狱后,其他成员创办了《国民日报》;苏曼殊就曾为这份报纸撰稿。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8]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

这些通商口岸的报章并不仅仅是政治武器;它们也为世纪转折后逐渐产生的一种新的大众文学,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自民报的起步阶段,在新闻中加插诗歌或者对当地风俗及戏剧的闲论以增添趣味,已成为办报的一个常用手段。一八九七年,上海一份报纸创办了一份特别的附刊,名为《消闲报》,自此引入文学副刊,并且迅速成为所有主要报章的固定栏目。随着市场对文学副刊的需求增大,一些较富创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出版独立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实际上就是从报纸中脱离出来,并增加了内容的文学副刊。一八九七年,李宝嘉(伯元)创办《游戏报》,随后出现更多同类的杂志。^[9]

新的“大众文学”就是在这些文学副刊与“小报”中成长、兴旺的。担任编辑的是一群可以被称为“记者文人”的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外语略有认识,但却有着更为坚实的传统中国文化背景。这些刊物的特色是充斥着过量的假翻译和诗歌,还有那些宣称要唤醒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但同时也以提供娱乐为目的的文章。

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以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一九〇三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借着援引西方的事例,他坚称小说在更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及道德状况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0]《新小说》的内容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包括带有政治及社会信息的

小说、剧本、诗歌、歌曲,以及一些质量参差的西方科幻小说和侦探故事的译本。杂志以托尔斯泰、雨果、拜伦、雪莱、歌德、席勒、梅脱灵,还有波兰浪漫派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一八四六~一九一六)的肖像做封面,但是却从未翻译过他们的作品。^[11]

林纾后来就是在这本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他所翻译的哈葛特小说的,而一些才华横溢的通商口岸“记者文人”也在这里初试啼声。吴沃尧(趺人)也许是最著名的一位,他写了一部出色的社会政治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双周刊《绣像小说》的主编李宝嘉,不但凭着《官现现形记》、《文明小史》及《活地狱》等大受欢迎的连载小说,把传统讽刺故事推向完美,同时还涉足翻译工作和介绍西方通俗历史,如他的《泰西历史演义》(“演义”是在传统侠义或历史小说题目中常见的用词)。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译作包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天方夜谭》以及《伊索寓言》。^[12]

这些作家为了如期交稿和赚钱,不惜粗制滥造。假如发现一本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某一期內每一篇作品的作者,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包括城市人口中识字与半识字的部分。

“记者文人”以及他们创新独特的通商口岸文学报刊的流行,代表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象,就是:早在现代白话文文学随着“文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已经取道报业的后门,偷偷潜入通商口岸的文学界。随报附送的或是独立的文学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读者群不断扩大,为“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的人开拓了一个市场。而且,这些通商口岸的“记者文人”在他们艰苦的谋生过程中,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把从事文学作为一项职业,不但可行,而且能够获利。至于进一步确

立：作为文人不但有利可图，而且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传统，则有待他们的“五四”承继者了。

“五四”时期的报业与文学

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商赞助他的新杂志时，大部分的文学副刊仍然为“记者文人”所操控。民国建立后的头十年，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13]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他们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记者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竞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大，要和这些地位稳固的刊物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4]

随着《新青年》发出对“新文学”的响亮号召，作者们需要更多渠道宣扬他们的理想，并且试笔。他们很幸运地在三份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上找到肥沃的土壤。在上海，国民党的《民国日报》通过其文学副刊《觉悟》向他们提供了支持。其中一位刚刚成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刘大白，就是在这份副刊上首次试验他的半白话爱情诗。^[15]其他著名的投稿者还包括：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杜威（John Dewey）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16]同时，新文学在《学灯》上找到另一个发表的途径。《学灯》创办于一九一八年，作为《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以及由梁启超的弟子所组成的“研究系”的喉舌。它的首任编辑宗白华，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并且刊登了

郭沫若寄来的每一首诗,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郁达夫的早期作品:《银灰色的死》,最初也是在《学灯》上连载的。一九二一年,《时事新报》再发行一份附刊——另一本文学杂志:《文学旬刊》。主编是郑振铎,投稿来自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

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早期精英都是由梁启超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出版机构所“寄生”哺育的。

新文学的第三位斗士是北京的《晨报》。它的文学副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都要归功于一位热枕的文人的努力,他就是曾经戏称自己为“没有作品的作家”的孙伏园。^[17]他抱着一种传教式的热情,推介北京的新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周氏兄弟——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份副刊上连载的。一九二三年,因为鲁迅的一首讽刺诗《我的失恋》在未经孙伏园同意的情况下,在付印前被另一位编辑抽起,孙伏园愤而辞职。^[18]但是这本备受推崇的杂志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下跌,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当主编的时候达至新的高峰。而孙伏园离开《晨报》以后,接掌了北京《京报》的文学副刊,继而把它变为另一个新文学的堡垒。

有这三份报章的开路,其他报刊很快便效法。以宣扬新文学为目的,数以百计的“文学副刊”和杂志创刊。^[19]至于其他已经面世的刊物,则从星期六派文人手中被夺过来,转为为新文学服务。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原本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个稳固地盘,一九二一年被文学研究会接管,并且成为其中一份最流行的新文学杂志。《申报》的文学副刊《自由谈》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于是,“记者文人”所建立的旧舞台被粉饰一新,继而上演新的剧目。

京 派

随着文学刊物的蓬勃发展,文学团体的数量也大幅上升。茅盾估计,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在主要城市中有超过一百个文学团体。它们以“星星”、“婴孩”、“玫瑰”、“浅草”、“绿波”、“微笑”、“嫩芽”、“春风”、“晨曦”、“火焰”、“彩虹”、“晓光”、“卿云”、“澎湃”等年轻而生气勃勃的词汇命名。^[20]它们大部分都是由大学生和中学生组织的,至于领头的,当然是在北京的教授和学生。一九一八年一月以后的《新青年》编辑委员会,起初包括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复和沈尹默,全都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月评论》。十一月,一群北大学生——著名的有傅斯年和罗家伦——在陈独秀、李大钊及胡适的协助下创办了新潮社,并且发行一本同名月刊。^[21]新潮社的其他成员包括诗人及散文家朱自清、小说家叶绍钧、出版商及北新书店店主李小峰,还有孙伏园。在孙伏园接手《晨报》的文学副刊前,它的第一任编辑正是李大钊。这份副刊对于推广那些后来闻名遐迩的作家的作品——如周氏兄弟、康白情、叶绍钧、徐志摩及沈从文——起了很大作用。

在北京的杂志编辑和投稿者,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新文化拥护者的群体,可以称之为“京派”。一位文学史家把他们标示为学院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与北京的大学有直接关系。^[22]二十年代的前期,这个群体虽然在组织上不定形,但是,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领导者,表现了一种明确的团体精神。不过渐渐地,当中的不同阶级之间开始出现摩擦。随着一九二五年冬,徐志摩出任《晨报》文学副刊的主编,形成了一个主要由那些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人组成的新阵营,其中包括:徐志

摩、陈源、赵元任、闻一多以及他们的亲密弟子或伙伴,例如凌叔华(陈源夫人)和沈从文。一九二一年,胡适与陈独秀及他的《新青年》同事闹翻后也加入了这个阵营,他们随后成为了新月社的核心。余下的那些,围绕着鲁迅、周作人和孙伏园的杂志,成为原先的“京派”的骨干。

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两个派别都以一种学术性的城市化为特征。英美派在政治和文学观点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而核心派则对经典中国学说更感兴趣,并且逐渐采纳了传统学者的特色——不是诗意的或小说的创造,而是博学、在品味上的老练、在政治上的节制,还有偏好研究和注释。其中的一些人,如俞平伯和顾颉刚,完全撤出文学前线,投入到“国粹”的重整,为此提供了这一派与胡适之间唯一剩余的联系。胡适也承认自己有“历史癖好”。

“京派”的核心:周氏兄弟、孙氏兄弟(伏园和伏熙)、李小峰、刘复、钱玄同,还有别的一些人,是后来的语丝社和《语丝周刊》(一九二四~一九三〇)的创办人。在声称“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同时,^[23]他们也喜欢对时人的态度、道德和品格略加挑剔和稍作攻击,同时尽力避免激烈的口号或者有建设性的提议。这种著名的语丝风格令人想起过去中国文人的清谈传统。当然,鲁迅是一个例外。尽管他尝试淡化意识形态的内涵意义,^[24]他和这一组织的联系仍然是他性格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之一。而由于鲁迅的参与,语丝社得到左翼及左派历史学家不合理的温和对待。^[25]

“京派”并没有垄断北京的文学界,也并非没有人挑战他们的主导地位。根据鲁迅所说,一九二五年,出于对孙伏园的《京报》副刊的不满,少数新晋作家和学生创办了一个小型的文学团体“莽原”。^[26]鲁迅被邀请担任他们的周刊主编,这本周刊也是随《京报》附送的。但是内部斗争很快便接踵而来。

其中一位自负的领导者高长虹,在上海组织了另一个昙花一现的团体,冠以“狂飙”这一堂皇浪漫的词汇。鲁迅也和另一个由韦素园、李霁野等人领导的小组织“未名社”相联系。它似乎是“莽原”的一个延续,但却因为和高长虹的个人冲突而坚称其独立性。^[27]类似的乍现即逝的文学团体充斥着北京和上海,但是,随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势力日增,起初混乱和无定形的局面,渐渐让位于两个强大的文学组织在表面上的对峙。

文学研究会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几个对新文学感兴趣的人在北大聚会,商讨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当茅盾(沈雁冰)被任命为《小说月报》主编,并且为他在北京的朋友们提供机会,彻底翻新这本鸳鸯蝴蝶派小说杂志时,他们的设想变为现实。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共有二十一个人;十二个创会会员及九个新会员出席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创会会议。^[28]一个星期后,第一期革新了的《小说月报》(十二卷一号)在上海出版,刊登了一则简章和一份宣言列出三项指导成立文学研究会的基本原则:

联络感情。研讨会的创办人看到了新旧文学拥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而这分歧甚至也存在于不同的新文学支持者之间。“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增进知识。要获得的知识是从外国来的。“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因此,研究会希望“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

建立著作公会的基础。“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29]

这份宣言应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第一项原则宣告了现代中国作家的正式出现,他们要为新文学而团结一致。第二项原则响应了《新青年》的主张,就是:旧的中国文学传统是不够的,现代文人应该向西方借鉴。第三项原则提出了一个真正前所未有的新立场:文学应该被视为一个严肃的、独立的及光荣的行业。他们那些通商口岸的报刊前辈铺下了基石,文学研究会——如其创办者所设想的——则是去巩固这个基础,并且借组织一个萌芽的联合,扩大作者的兴趣。

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创办人包括,作家:周作人、茅盾、许地山、王统照、叶绍钧;编辑和翻译家:孙伏园、耿济之;学者:郑振铎、朱希祖、瞿世英、郭绍虞;甚至还有一个军人:蒋百里。他们全都身在北京。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文学研究会的组成反映了和“京派”的一些重叠。不过,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以及各分会在广东和其他城市的设立,其架构变得十分开阔,以致看来非常模糊。^[30]再者,虽然研究会的正式地址在北京,它的期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要么在上海发行,要么合并入上海的《时事新报》。结果,北京的影响被进一步淡化。因此,文学研究会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扩大了文学活动场所的范围。

文学研究会的第二个贡献则在巩固和普及新文学从事者的新角色。其出版物,特别是《小说月报》,在青年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发行量也更广,以致在研究会的其中一本刊物上发表作品,就相当于得到许可,进入文人的精英圈。相比创造社的刊物,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对圈外有天份的人,是较为开放的。

第三个贡献是文学研究会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虽然这在某程度上值得怀疑。研究会的其中一个最有野心的设想,就是计划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公布的将会出版的一百零一种书目中,有七十一一种会是翻译作品。^[31]但是这在最后的结果里没有完整的数据。^[32]总的来说,苏俄和东欧的作品占了主导地位,不过也没有忽视法国作家。《小说月报》出版了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以及被压迫民族文学、非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专号。介绍了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尔、莫泊桑、左拉、法朗士、布莱克、叶芝、罗逖、梅里美、Johan Bojer、罗伦斯,甚至但丁和维吉尔。长长的作家名单,清楚指出文学研究会没有单独拥护某一作家、某一类型或是某一国家的文学作品。广泛的覆盖也揭示了这个团体缺乏自身的集中性和深度。一九二五年,文学研究会到达了活动的巅峰,随后稳步下滑,直到一九三〇年无声消失。

创 造 社

创造社是由一群亲密的朋友组成的,最初包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当他们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时,在经过一轮非正式的讨论后,他们决定要出版一本杂志,以散布他们自己的新文学。他们回到中国后,一间小型上海印刷厂泰东的经理,是第一个利用他们的天份谋利的人。一九二一年夏天,泰东图书局发行了第一辑创造社系列,共四部作品。郭沫若追溯,创造社正式成立的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上述的四位创办者,还有何畏和徐祖正,在郁达夫位于上海的寓所开了一个会,决定出版一本季刊,并根据郭沫若的提议,命名为《创造》。^[33]创造社持续了十年,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